



呂正志名文穆轉志獻歐陽文忠王制 恰符鄉美得三多 駱夫六十一介唐五十九
 公解騎林官燕余今年亦六十六矣 地中朝官惟三羊最長官
 輒半馬應僞走歲喜龍蛇劫已過它日鏡湖國政事三頭二相一漁養

甲午元日既以詩詒教夫介唐復東子獻

潞公甲子唐同符 君生於 隨雁行間高稍殊欲例蒼夷數溫國亦援爲洛補
 兼著各標桐木諸韓望 余所居保安等街門有古槐大十餘圍都人倚樹待續芝
 山四皓圖 君尊人嘗於山中得芝一 又采瀛洲方味登釣竿容我拂珊瑚

越縵堂日記說詩全編

上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清」李慈銘 著

張寅彭 周容 編校

越縵堂日記說詩全編

上

〔清〕李慈銘 著

張寅彭 周容 編校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越縵堂日記說詩全編 / (清) 李慈銘著 ; 張寅彭,
周容編校.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80729-711-6

I. ①越… II. ①李… ②張… ③周… III. ①日記—
文學研究—中國—清代 IV. ①I207.65-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0)第049771號

- 書 名 越縵堂日記說詩全編
著 者 (清)李慈銘 著 張寅彭 周 容 編校
責任編輯 汪允普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蘇鳳凰揚州鑫華印刷有限公司
揚州市江陽工業園蜀崗西路 9 號 郵編:225008
開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張 38.5
字 數 80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80729-711-6
定 價 98.00 圓(全二冊)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514—85868858)

前言

李慈銘（一八三〇—一八九四）初名模^{〔一〕}，字式侯、法長。後更名慈銘，字愛伯，號蓴客，室號越縵堂，世稱越縵先生。浙江會稽（今紹興）人。他屢試不第，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始中進士，時已年過五十，以致翰林院文士，竟多為其後輩。官止于山西道監察御史。觀其一生，實有用世之心，無奈仕途不達，而生怨懟之憤情，又終以有學而保持了操守。李氏身當道咸同光之世，一方面對於朝政之積弊幾近絕望，既不屑為而又欲為之，而終於無所作為；一方面又以能繼乾嘉學術高峰之後而深幸生逢其時^{〔二〕}。他似從很早起對此即已有所意識，故全身心於經營自己的日記，詳載政情民俗、讀書心得，乃至人際交往、飲食起居，「積數百萬言，亘三十餘載。其用力也罔有或輟，其為事也

〔一〕李慈銘生於道光己丑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不數日即入庚寅年，為兩歲。而按西曆，皆屬一八三〇年。本文凡涉越縵歲數處，及標示的西曆，均按此計算。

〔二〕李氏嘗云：「考證之學，國朝為最，國朝尤以乾嘉之間為盛。能讀其書者，庶于經史無誤文別字謬辭枝說。士生其後，可謂千載一時之幸。」（咸豐十一年六月十九日日記）

無乎不賅。近之可方湘鄉日課之勤，遠之可繼亭林日知之博^{〔一〕}。故《越縵堂日記》的內容以政事和讀書劄記為兩大端。其「每讀一書，撮其指意，鉤元挈領，採擷其英華；起廢箴旨，糾繩其謬誤，略如《四庫全書提要》之例，而詳贍過之」，足當後學之津梁；而「斷爛朝報，有關一代之典章；鄉里逸聞，考見百年之興廢」，又可備史材於他日^{〔二〕}。對於自己的人生，此舉誠可謂有識、有為矣。

李越縵一生學術彙萃於《日記》。其學貫通四部，大抵以能守傳統學術之正宗為其基本性質^{〔三〕}。四部之中，略以史部為較長，而其心得之有系統者，則斷然當在集部之詩學。這不僅有他的

〔一〕王存《徵刊越縵堂日記啟》。

〔二〕同上。

〔三〕如于經學，雖不拒宋，所重則在漢。其評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云：「馬氏從孫毓說，以《傳》公孫指成王為非，而謂周公亦幽公之孫，以碩膚為膚革充盈，異於狼之跋扈，亦病纖鑿。鄭君箋詩，成於晚年，最為純粹。略舉五則，以見《箋》之不易讀，而鄭學之可貴也。」（光緒八年十一月初二日日記）評胡承珙《毛詩後箋》云：「胡氏此書，體例與並時馬元伯之《傳箋通解》、近出之顧訪溪《學詩詳說》大旨相同。不載經文，依次說之，兼探諸家，古今並列，微不至馬，而勝於顧。蓋馬專于漢，顧偏于宋，多識達詁，終為《詩》學專家。若其取義興、觀，多涉議論，後人之見，未必果得古人之心。此細繹經文，體玩自得，乃宋歐陽氏以後之法。唐以前家法皆重訓詁，而不為《序》外之說，所以可貴也。」（光緒八年六月十五日日記）又評顧惟康《學詩詳說》，則謂：「余不喜駁斥宋儒，而此等是非，自不可泯，聊一發之。惟康謂朱子說視舊說益為允當，真村夫子之見矣。」（光緒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日記）好惡立現。詩學則宗老杜，詳本文。

自評和各家之評爲證^(一)，也是多年來讀其《日記》、《讀書記》等留有的印象。而這，也是久不能饜心于蔣瑞藻輯《越縵堂詩話》之疏簡，必欲重輯一部完全的越縵堂說詩文字的緣由所在。當然，蔣輯《詩話》，事在民國初年《日記》甫面世之際，筆路藍縷，當年也曾提供了初識李越縵詩觀的方便，其歷史價值自不可沒^(二)。

越縵詩觀在同光之際別樹一幟，歷來受到重視。其《日記》中的說詩文字，量既不小，說亦充分。此次以一個較寬的標準輯錄（凡涉詩者俱錄），可謂始得其詳。種種議論，形成了他獨特然又極守正統、多方卻又能一以貫通、縝密而終致厚重的詩學思想。

(一) 如《白華絳附閣詩初集序》：「所學于史為稍通」，「所得意莫如詩」。王式通《越縵堂文集跋》：「先生說經，確守乾嘉諸老家法，于史學致力最深。」徐世昌《晚晴簃詩彙》：「生平博綜群籍，尤精于史。」汪辟疆《近代詩人小傳稿》：「越縵喜談經學，實非所長。一生學術，乃在乙部。詩文尤負重名。所作詩辭旨安詳，聲希味永。」越縵中年以後喜談經史，屢言「雅不喜評抹詩文」，此乃循「餘事作詩人」之老例也，非不重詩文。

(二) 蔣輯《越縵堂詩話》已收入拙輯《清詩話三編》，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一、高揚明詩的詩史觀

李慈銘最爲人詫爲獨異的看法，是他的高視明詩的詩史觀，以爲遠勝於宋。昔錢默存《談藝錄》論清詩諸家，曾揭出姚鼐、張際亮、譚獻等人宗明詩的立場，誠能探微^(一)。但清人主流之見一般都無置明詩于宋詩之上的，錢牧齋、朱竹垞都不曾採取過這樣的立場。直至與李氏同時的張之洞、

(一)《談藝錄》四一：「譚復堂好明人詩，故其論詩多皮相語。」同條補訂三謂翁覃溪「深不然惜抱之取明七子」，又云：「惜抱詩集卷五《碩土約過舍久候不至余將渡江留書與之成六十韻》：『在昔明中葉，才傑蹈高遐。比擬誠太過，未失詩人葩。蒙叟好異論，舌端騁鏤鐸。抑人爲己名，所惡成創痂。眾士遭豐蔀，皎月淪昏蟻。』爲明七子翻案，言甚激切。」又四三：「程秉劍《國朝名人集題詞》有曰：論詩轉貴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輕。自注：惜抱詩精深博大，足爲正宗。」默存於此處下按語云：「張亨甫詩集《潤臣以近詩見示率題》三首，亦以漁洋與惜抱並推爲風雅正宗。亨甫質美未學，心粗氣浮，祈向不過明七子。故姚石甫爲作傳，稱其少年詩才可及空同，若去其粗豪，則大復矣云云。亨甫《題葉潤臣詩》第二首曰：李何駢駕見高徐，風骨孤鶩世未如。不信後人輕七子，反成老馬戒前車。是其推崇惜抱，正以惜抱不廢明七子，可追配『清秀李于鱗』之漁洋耳。」

王闓運，乃至更晚的陳衍等，都無此立場^(二)。故從其明詩觀入，較易窺其詩學之實質。

李氏此說實亦其來有自，但其態度之正式，其說完備的程度，則非他家可比：

謝在杭謂明詩遠勝於宋。又謂宋人尚實學，而明人多剽竊，故究竟不及宋，語固矛盾。然予謂明詩實過於宋。季迪惜不永年，倘逞其所至，豈僅及東坡哉？中葉之空同、大復，末季之大樽、松圓，皆宋人所未有。宋人自蘇、黃、陸三家外，絕無能自立者。明人若青田、西涯、子業、君采、昌谷、子安、子循、滄溟、弇州、夢山、茂秦、子相、石倉、牧齋，皆卓然成家。即孟載之風華，亦高於昆體；中郎之雋趣，尚永於江湖。後代平情，無難取斷。貴遠賤近，徒以自欺。
(同治三年十月十九日日記)

謝肇淛的議論見於其《小草齋詩話》卷三。有意思的是，清初王士禛也曾注意到謝氏的這同一段議論，但漁洋對謝氏的矛盾之論，所取卻正與越縵不同：

(二) 明人學唐，自居宋上，則可不論。如李攀龍輯《古今詩刪》，以明詩直接唐詩，若無宋元詩者。清人宗明詩較顯者，如沈德潛編唐、明、本朝詩，亦不取宋元，謂「宋詩近腐，元詩近纖，明詩其復古也」(《明詩別裁集》序)。然李慈銘最不喜沈，以為不知詩，故李氏之明詩觀與沈絕無關係。

《小草齋詩話》云明詩遠過於宋。又云本朝僅數名家力追上古，然刻畫摹擬，已不勝其費力矣。其他作者，雖復如林，上乘雋語，人不數篇，要其究竟，尚不及宋。宋人有實學，而本朝多剽竊故也。右二條自相矛盾，當以後論為允。（《香祖筆記》卷二）

漁洋之取捨顯然較為穩健，代表了清人在宋、明詩比較上的一般之見^{〔二〕}。上述越縵堂「語固矛盾」云云，即承漁洋此語而來，但卻變貶為褒，改了方向。

當然，王漁洋對於明詩的評價，實際上也並不低，如云：「有明一代，作者眾多^{〔三〕}。」明興至弘治百有餘年，李、何崛起中州，「明音之盛，遂與開元、大曆同風」^{〔四〕}。明確地肯定七子，並以明詩直接唐詩。他在康熙間，既承錢牧齋《列朝詩集》之說，又對牧齋貶斥前後七子過甚的弊端，下大力予以批評糾正，而與同時的朱彝尊不同。竹垞撰《明詩綜》，雖亦為糾牧齋而作，但對七子的看法基本

〔二〕 漁洋答劉大勤問，對此講得較為具體：「明詩勝金元，才學識三者皆不逮宋。而弘正四傑，在宋詩亦罕其匹，至嘉隆七子則有古今之分矣。弇州如何比得東坡？東坡千古一人而已。」（《師友詩傳續錄》，載《清詩話》）

〔三〕 《七言詩抄凡例》。

〔四〕 《蠶尾續文》。漁洋與七子詩學的承繼關係，清人多已識之。如紀昀云：「漁洋以清空縹緲之音，變易天下之耳目，其實亦仍從七子舊派神明運化而出之。」（《冶亭詩介序》）

上仍承襲錢說。漁洋則明確表示：「弘、嘉間，虞山先生之論不足為據」。^{〔一〕}故相較於牧齋的否定明詩主流詩派的明詩史之建設論，漁洋（也包括竹垞）的明詩觀要遠為正面和積極。不過清初直至乾隆時的百餘年間，詩壇始終保持着幾近眾口一詞的對於七子乃至明詩的譏斥之聲，反映的實際上是牧齋的立場。漁洋詩學雖也聲勢不小，乾隆間甚至還以張宗柟編成《帶經堂詩話》而再掀高潮；但在與明詩的關係方面，他本人卻又再三被人貶作「何大復」、「李于鱗」^{〔二〕}，成為康乾間代明人受過的集矢之的。

李慈銘的明詩觀直承漁洋，所以對上述漁洋取捨謝肇淛之論的不同，他才會略過不表。他實是繼張宗柟之後漁洋詩學的又一位知己。據他本人多次明白宣示，其詩學之取徑，獨許本朝之王

〔一〕《古夫於亭雜錄》。轉引自《帶經堂詩話》卷四。

〔二〕邊連寶《病餘長語》卷六引戈濤語，比之為何大復：「近日新城之學遍天下，余以為一信陽而已。信陽畫自唐以上，新城則兼汜濫宋元以下，故每作一詩，胸中先據有一成詩，而後下筆追之，必求其肖而止。所作具在，可一按也。余非敢瑕疵前人，然恐詩道坐敝於此，則明七子不獨任咎。」又吳喬《答萬季野詩問》有「清秀李于鱗」之譏，即指王士禛。趙執信《談龍錄》：「阮翁素狹，修齡亦目之為清秀李于鱗，阮翁未之知也。」紀昀《冶亭詩介序》：「吳修齡目以清秀李于鱗，則銜之終身，以一語中其隱微也。」則似漁洋非不知其語，與秋谷微不同。日人青木正兒《清代詩歌評論史》推測是指錢謙益，誤。

士禎和朱彝尊兩家。他尊竹垞爲師承之肇始，自謂十七歲即喜閱《明詩綜》，「平生得詩法之正，實由於此」^{〔一〕}。對漁洋則服其精確：「王漁洋論詩悟絕古今，尤善分別」^{〔二〕}。李氏論人一向少所許可，故這些表白於其詩學的意義自是重大。

越縵對明詩之高啟、李東陽、前後七子、公安、程嘉燧、陳子龍乃至竟陵鍾、譚等幾乎所有的詩人詩派，雖評騭不等，但都持肯定的態度。其中尤其對李夢陽高致推崇，對李攀龍的評價也較牧齋、竹垞等大幅提升，而最與漁洋同調。從前牧齋貶斥二李，卻又欲高抬明詩，遂不免陷於抵牾；流風所及，明詩的地位在牧齋身後之清人的一般評論中，自然也就因重貶七子而始終不會很高，甚至被棄如敝屣了。越縵兼重二李，不僅與牧齋、竹垞不同，也較漁洋對滄溟的態度更為徹底^{〔三〕}，這就使肯定明詩主流派別前後七子，與肯定明詩的結論，在邏輯上完全理順了關係。

〔一〕參其光緒十年閏五月初八日日記。

〔二〕參其同治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日記。

〔三〕汪琬《說鈴》記漁洋語：「若遇仲默、昌穀，必自把臂入林；若遇獻吉，便當退三舍避之。汪云：都不道及汝鄉于鱗耶？漁洋默然。」可見漁洋對滄溟態度之曖昧。

但時至同光，李慈銘全面肯定明詩的意識和努力，仍然如漁洋在康乾間那樣，並不能成為明詩研究的主流立場。如光緒、宣統間產生的又一種大型總集類著作《明詩紀事》（陳田輯）^{〔一〕}，雖詳列明詩各期作家及前賢各家之見，並作有各期之小序及大量按語，但其輯旨除了「尤亟致意於明末」一條外，對明詩主要時期的看法，大抵仍在牧齋與竹垞的牢籠之下^{〔二〕}。陳田與李氏同時而稍後，或因兩人時代相距過近，《明詩紀事》竟未採及李慈銘之語^{〔三〕}。這也可見越縵堂的明詩觀，在當時似

〔一〕《明詩紀事》自序稱十簽四千餘家，今實存八簽三千餘家。未刻兩簽，據章培恒推測，當為方外、閨秀（一九九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明詩紀事·前言》）。其說是。

〔二〕如觀其所編採前後七子、公安三袁、竟陵鍾譚等家及所下按語，便可知其於明詩主流作家並無所見。書中雖以違礙而不錄《列朝詩集》之語，但其看法實多陰取自牧齋。如論李夢陽，專言其對李東陽之態度前恭後倨，與《列朝詩集》李東陽條之專拉空同比附，可謂前後呼應。此書之發明僅在詳于明末而已，辛集序所謂「在昔漁洋與竹垞論選明詩，謂不宜略遠詳近。以今日而溯朱明，年將三百，亦云遠矣。余搜採明末諸家，補《詩綜》之闕漏，于斯集尤亟致意，然未敢言備也」。

〔三〕《明詩紀事》中採入的各家之論，最晚似是道咸間人，如莫友芝《邵亭集》、潘德輿《養一齋詩話》等，均稍早于李慈銘。

未能產生實際的影響〔一〕。

二、宗明詩與宗杜一致

李越縵的明詩觀，對他本人的詩學是有極大之干係的。他對宋以後詩學兩個核心問題的看法：（甲）宗老杜，（乙）作詩之才、學關係，即與其全面肯定明詩的立場聯繫為一體〔二〕。

明七子所宗乃是老杜。這是繼《毛詩》後，中國詩學在中唐以後逐漸確立起來的最正大之根據。前、後七子以其作為明詩最大派別、延續時間又長的超強影響力，為這個新的詩學根本原則做了一次宏大的實踐和宣傳。所以對於一代詩史乃至於宋以後詩史中的這一股主潮流，如果不能識其成立的正當性，則不惟明詩史無以建立，明詩之前的宋詩與之後的清詩也將無以承接，整個中國

〔一〕越縵嘗自謂：「予憨拙，不能事貴遊，又素偃蹇，懶酬應，平時未嘗以文字語人，故問名者絕少，亦不以此為意。」潘曾綬題其集，亦歎喟：「才如之子少，海內孰知音。」（俱見咸豐九年十月初二日日記）雖系其早年境況，然頗可概其一生。

〔二〕錢鍾書曾云：「當時浙人如李蓴客等之學唐人，實皆以明詩作階梯，故議論亦祇如官府呵道聲耳。」此似未能窺其實質。（《談藝錄》四一）

詩史的下半段，或將如七寶樓臺散為碎片矣。這裏實際上有一個以宗杜為核心的「詩統」的問題。漁洋、越縵的明詩觀即在此等處顯示了他們頗為卓異的眼識。如漁洋云：「宋明以來詩人學杜子美者多矣。予謂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氣，魯直得杜意，獻吉得杜體，鄭繼之得杜骨。」一以老杜貫串中唐至明人，可謂抓住了宋以來詩史的主流。人們一向都習慣將漁洋更多地與王、孟聯繫在一起，這就其全部詩學而言，自然也不能算是太大的誤會，但終究還是有失偏差的。而明末清初人批七子，初雖有其合理性，然越批越烈，無所節制，往往傷及宋元明清詩之學杜這一條主線脉。」（清人亦宗杜。）

李慈銘重視和維護明七子，主要也在于七子學杜的實績，他認為七子是明清詩人中學杜之最為成功者。他也曾自詡自己為「真杜」。他對此的用心是極為認真的。此次，據弟子周容勾稽越縵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二月至四月之相關日記，復原了一樁十分有趣的逸事，頗可看出越縵推崇

〔一〕《池北偶談》。按，王世貞《藝苑卮言》有「國朝習杜者凡數家，華容孫宜得杜肉，東郡謝榛得杜貌，華州王維楨得杜一枝，閩州鄭善夫得杜骨」之評，漁洋蓋襲而變化用之。

〔二〕如明人對七子宗杜與學杜不成還是分別當成兩個問題來予以認識的。楊升庵云：「唐子元薦與余書論本朝之詩，李何一出，變而學杜，壯乎偉矣。然正變雲擾，而剽襲雷同；比興漸微，而《風》《騷》稍遠。」轉引自《明詩紀事》丁簽卷一。但錢牧齋以後即不復分辨，以吳喬「明詩無意」，明詩為「瞎盛唐詩」等說最為激烈，見其《圍爐詩話》。

七子學杜的成績以及強友人認同自己為「真杜」的具體情形^(一)。其中四月十九日的日記云：

作書致香濤，示以昨詩。得香濤復，言予詩雄、秀二字，皆造其極，真少陵適派。其火候在竹垞、阮亭之間。竹垞、阮亭七古，皆學杜也。此語殊誤。阮亭七古平弱已極，無一完篇，豈足語少陵宗指？竹垞亦僅規東坡耳。若予此詩，擬之空同、大復，則殆庶乎？再作書致香濤，申言作詩宗派及李杜韓白王孟錢劉沈宋溫李諸家之優劣。

「昨詩」者，乃越縵應友人董文渙請，為秦宜亭所畫《太華衝雪第二圖》所題的一首七古^(二)。詩成後，董評為「學韓」，不當越縵之意^(三)。而對張香濤「真少陵適派」之評，他自無間然，但也不盡滿意，還要耐人尋味地進一步細繹出朱、王兩家的學杜不如李、何，而甘于自比李、何。此處亟可見出他認定明七子為老杜正宗之立場的異乎尋常的認真程度。

李慈銘對於自己的詩歌要達到「真杜」的期許及自信，是與他真切體認到老杜在宋以後詩創作

(一) 詳周容博士學位論文《論李慈銘與樊增祥的詩歌理論及其創作》第三章。

(二) 《再為峴樵題秦宜亭所畫太華衝雪第二圖》。載《白華絳附閣詩》癸集。

(三) 同治十一年四月十八日日記。

中所具有的最高典範的意義相聯繫的。而他于杜也確實是有真體會的。他早年即對杜下過大力，以至于被言杜諸子公認為「善學杜」〔一〕，甚至對其《王戎元日作》一詩有「乃真杜，不必云學杜、擬杜」的至高之評語〔二〕。他對杜工部集作過系統的批注，故對杜詩全體的把握頗為自負：「予于杜詩，雖瓣香所在，顧僅得其大意，不求甚解，故鮮全首能背誦者。舉其命脈氣息，即覺了了目前，奧窔深微，暗合無間。少陵復起，亦不以爲妄語耳」〔三〕。他即從此種把握大局的角度，對前人批評《八哀詩》諸病，表示不以爲然：

宋人葉石林極詆此八詩，謂《李邕》、《蘇源明》兩首，累句尤多，國朝王漁洋、姚鼐塢皆摘其疵。所言誠然。然讀詩當觀其大體，讀杜詩尤當取其真詣，略其小疵。此八詩是杜公憂傷國事，兼述平生素懷，交友大略，非但思逝感舊，觀詩序數語可見。其篇中雖多率句，亦間傷冗漫，而忠憤之氣，溢於言外。神采奇發，自是高作，不得執一字一句繩之。正如長江大河，沙石雜下，雖不如寒潭清澗瑩澈可愛，而得不推爲偉觀？後人以顏光祿、張燕公《五君詠》爲比，以

〔一〕咸豐十年閏三月二十三日日記。

〔二〕同治元年元月十九日日記。此或爲李氏自評。然不論自評他評，俱可見其學杜必至的決心和信心。

〔三〕咸豐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日記。

彼簡貴而此蕪粗，非其倫矣。若楊升庵力駁詩史之說，謂詩言性情，非道政事，以詩當史為宋人腐語，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夫孟子不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乎？後之學詩者，才力儉薄，則當效顏、張，毋效杜公所謂扛鼎絕續也。石林謂嘗痛刪「李」、「蘇」二章，僅取其半，不知所刪若何，恐必失其旨趣。（《越縵堂讀書簡端記》之《杜工部集箋注》卷七）

按，翁方綱亦曾糾彈過漁洋對《八哀詩》的批評，但他也是從具體句法、字法的角度來反駁漁洋的意見，以為漁洋「以妙悟超逸為至，與杜之陰陽霽帥、利鈍並用者，本不可同語」〔二〕。李越縵則重在體察「杜公憂傷國事，兼述平生素懷，交友大略」的所謂「真詣」，而「略其小疵」，與覃溪的偏重於技法異趣。

而越縵堂所識的杜之「大略」，又與當時的一般之論不同：

人徒見杜詩之渾厚雄直，刻摯沈著，而不知其精深華妙，空靈高遠，多上追《三百》，下包六代。如《麗人行》乃深得樂府豔歌之遺，《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諸詩，何減《十九首》？其律詩如「花妥鶯捎蝶，溪喧獺趁魚」、「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

〔二〕詳《漁洋評杜摘記》（《石洲詩話》卷六）。載《清詩話續編》。